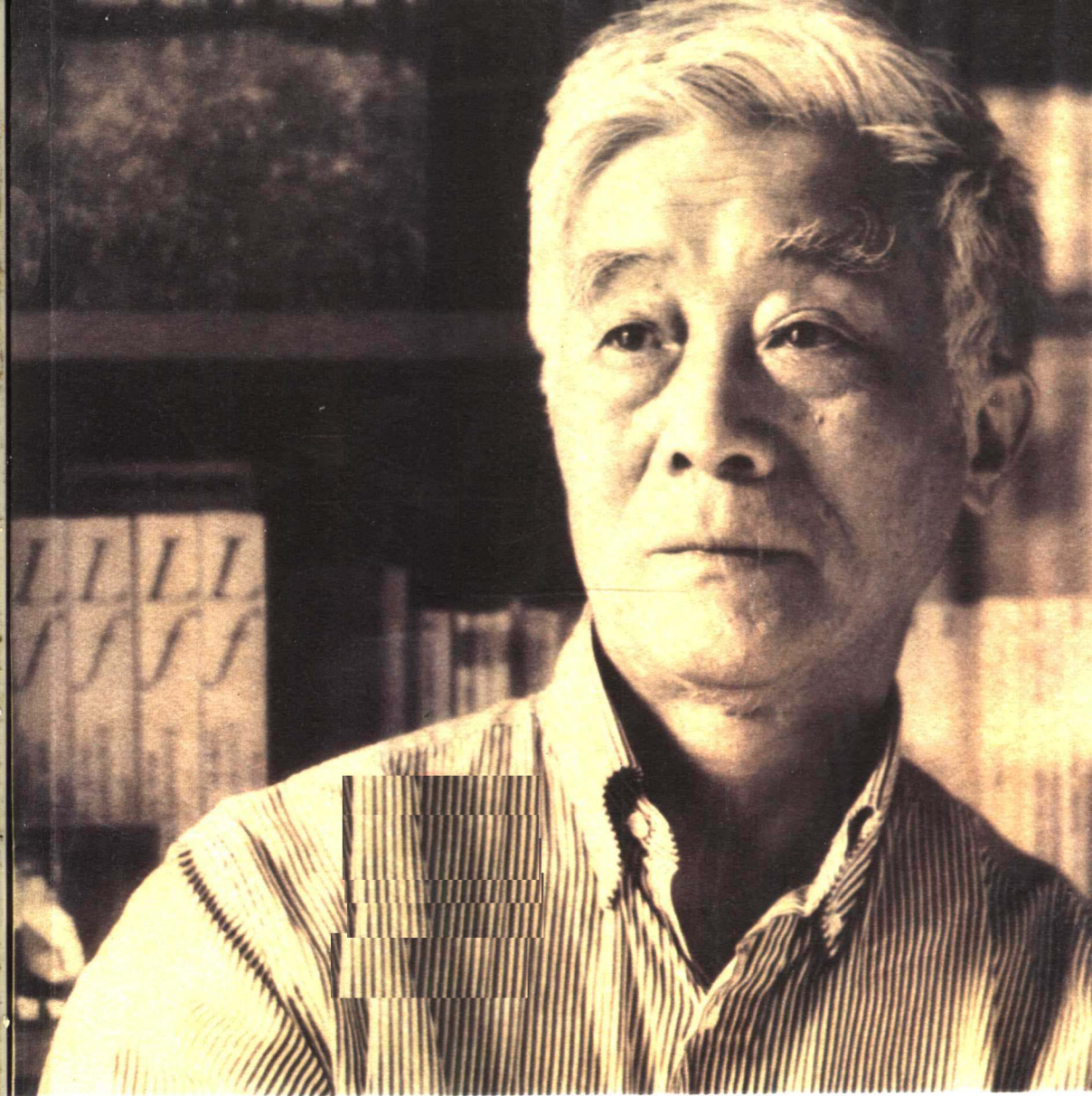




浪漫弹指间

我与法兰西文学
柳鸣九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浪漫弹指间

我与法兰西文学

柳鸣九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弹指间：我与法兰西文学 / 柳鸣九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623-734-2

I.浪... II.柳...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022 号

浪漫弹指间：我与法兰西文学

作 者：柳鸣九

出版统筹：单占生 张 明

策划编辑：陈 静 方 伟

责任编辑：陈 静 刘晨芳

美术编辑：刘运来

责任校对：伊春萍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郑州市鑫苑路 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450011

承印单位：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7

印 数：1-8,000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623-734-2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人去恩在也

一个厨师的人生追求	2
——父亲的故事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9
——追忆朱光潜先生	
我的启蒙老师吴达元教授	26
怀念郭麟阁教授	30
徐继曾与柏格森	35
仁者李健吾	39

挨过翻译生涯

我的绿色家园	66
——我译都德	
我主编三卷本《法国文学史》	72
一个漫长的旅程	78
——写在《F.20 丛书》七十种全部竣工之际	
与“魔鬼”签契约记	90
一个被逼出来的译本	108
——我译莫泊桑	

与“巨人”比肩而立

“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	114
——访阿兰·罗伯·葛利叶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127
我所见到的“不朽者”	138
——访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现代派文学的“工匠”	147
——访米歇尔·布托	
访雨果学权威雅克·塞巴谢教授	163
她耕种自己的园地	174
——访娜塔丽·萨洛特	
与克洛德·莫里亚克谈法朗士瓦·莫里亚克	185
“铃兰空地”上的哲人	193
——访米歇尔·图尔尼埃	
塞利纳的“城堡”与“圆桌骑士”	207
——访塞利纳故居	
弄炸药而没有伤手的人	216
——访亨利·哥达尔教授及其他	
谁道人生无再少	228
——渐渐走近埃尔韦·巴赞	
法国当代的契诃夫	245
——访罗杰·格勒尼埃散影	
老字号“NRF”与它的一位“掌柜”	255
——记雅克·雷达	



人去恩在也

一个厨师的人生追求

——父亲的故事

只要桌上洒有一摊茶水，他总是用筷子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有时是练正楷，有时是练草书。几乎每坐在桌前，他都这么在桌上操演，甚至是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事聊天时，他也往往要这么“开小差”。从我幼年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据长辈们讲，从一进城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到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他进入中年时，他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他的字，在体态上，有颜真卿的稳当匀称；在笔法上，则有柳公权的俊秀遒劲。对于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听他说：“文化高的人看了我开的筵席菜单，都说字写得漂亮，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得这么好。”

他出生于贫困的农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他只念过两个月的书，从六岁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气并不寒冷，但他因为没法穿得不单薄，放牛时常要靠着土坡避风躲寒。他十一岁时进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楼当徒工，他妈把他送出村外，伫立远望，久久不肯离去。从此他由于谋生与颠簸，再没有回过乡下，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只是在几年徒工生涯中，用竹筒里好不容易攒下的全部零钱，终于买得几丈“洋布”，请人捎回家乡送给老妈，但老太太没有收到就离开了人世。

以罕见的刻苦与勤奋，他熬到了“出师”，结束了徒工生活，先作为廉价劳动力在餐饮业闯荡了多年，风餐露宿，漂泊颠沛，有些夜晚，仅以一条长凳为床。尔后，逐渐以做得一手好菜与写得一手好字而颇有名气，得以有人经常雇用，他这才娶上了妻子，接二连三生了三个孩子。按当时世俗的眼光，他的运气不错，竟然三个都是男孩。但拖儿带女，养家糊口，难度更大，他虽已成了“名厨”，上了一两个档次，但仍天南地北，浪迹东西，艰辛如故。不过，毕竟成了“名厨”，只要不是失业，以“黄牛式”的勤劳辛苦，倒也能换来全家不饿不寒的日子。



：作者的父亲、厨师
柳世和在60年代

除了谋生与繁衍后代，人与动物的区别恐怕就是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了。人的层次不同，对此虽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但皆有之，却是共性。这位农民之子，这位厨房里的劳工，也有自己的理想。尽管他在本行当中出类拔萃，但他从没想过要培养自己的儿子跟着他干这一行，哪怕是动用三个男儿中的任何一个。其实，作为一个跑单帮的个体户，他跟前

急需一个徒儿、一个助手，何况他还有好些烹调的绝招、独学有待传授。他常叹息自己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没有体会，但我的确见过体胖怕热的他在蒸笼一般的厨房里，在熊熊大火的炉灶前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往往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抚摸着儿子的头，感慨道：“爹爹苦了这么多年，就吃亏在没有文化……好伢子，你们要做读书人。”

“做读书人”，这就是他对下一代的理想与期待。理想不小，但他自己的能耐却极其有限。他身上毫无可以泽及后代的书香，没有可以使后人轻易受惠的“秘方”与技艺，他只有那点可怜的文化经验：练字，只能把这点简易的经验，用来种他三亩地的实验田。因此，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必须服从努力练字这么一个“硬道理”，这条“死规定”。他常教训我们道：“写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门砖，就是看家拳。”当然，他待我们比待他自己宽厚得多，他并不要求我们像他那样蘸着茶水在桌面上练字，而是花钱替我们买笔、买墨、买砚、买纸，还有字帖。于是，练字就成为了三个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课”。这条硬规定对长子更是“雷打不动”，这不难理解，他可能最殷切希望早日从长子身上看到效果，就像皇帝老子总想要

长子来传承自己的王位。

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这是常识。这常识，他懂。也正因为是世人所公认的常识，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为了一条神圣的原则，他执行起来，似乎比常人更认真、更执著、更不打折扣。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浪迹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学在当今尚且如此之难，在那个年月就更难了，虽然当时没有户籍制，没有就近入学的规定以及赞助费的障碍，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

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了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每迁徙到一个城市，父母亲最优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业，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时，何时迁居、何时动身都是以我们在学校的“档期”为准，决不耽误我们的学业。

正因为一辈子都在悲叹自己没有文化，这一对父母，始终竭尽全力坚持着他们可怜的“子女上学读书至上主义”。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50年代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迁徙，他们的长子却几乎从未中断过从小学进初中再升高中的学业，而且由于他们竭尽了全力，耗尽了积蓄，这小子每到一个城市都得以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从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中学到湖南的名校广益中学与省立一中……

巴尔扎克有一篇很著名的小说，写的是巴黎一个贫苦的挑水工人，出于爱心，以自己一个子一个子攒起来的全部积蓄，支持一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最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医生。这一对可怜的父母与那个挑水夫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在以微薄的收入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都是长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需要含辛茹苦、自我牺牲。我的初中时代与我弟弟的小学时代，恰逢“乱世”，物价飞涨，学费高昂，非得付“硬通货”才能入学，而入学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硬费用与硬消耗，以及为了在好学校上学而必须维持某种“体面”所不得不付出的“软”消费，更不用说为了保证儿子准时的起居与一日三餐，而长年累月付出的辛勤劳动了……这是亲情的“长征”，这是坚毅的苦

熬，这是慈爱的奋斗，这是精神的追求。

对于这个农民之子来说，这一奋斗，这一“长征”，这一苦熬，这一追求，几乎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坚持，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在坚持着。事情是这样的：

4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餐饮业、厨艺行业大为萧条，他在内地谋职谋生殊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60年代中期才回家乡。那一个时期，香港的天，还不是“解放区的天”、“晴朗的天”，父亲在香港之所以一待就是将近二十年，唯一的原因就是谋生。50年代，运动此起彼伏，横扫旧制度、旧思想、老习俗、老生活方式，高级烹调术吃不开了，被视为剥削阶级享乐服务的玩意，与父亲同一行业的“名厨”纷纷失业。父亲为了四口家人不至于衣食无着，为了三个儿子不至于失学，只好咬紧牙关，单枪匹马，在那尚未“放晴”的天空下做一个老年打工仔了。要知道，他的这三个儿子正一个接一个进中学、进大学，三笔学费与三笔生活费是那时一般家庭绝对承担不起的，而这三个学生要得到国家与组织上的全额补助与照顾又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父亲的职业是为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服务的，其家庭成分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有天壤之别，只能算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根本没有资格依靠组织，向党伸手，即使提出为了进步而申请入团的要求，其中那个领头羊也因为“家庭成分不纯”而三次被否决，后面那两个见势头不妙，也就望而却步了。

那些年，我正好经历了上中学、念大学直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过程，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每个月，我都按时收到家里寄给我的学杂费与生活费，毫无忧虑地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微薄的工资远不能负担母亲的医疗费与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因此，父亲仍然留在香港打工，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用漂亮的行书给他的“贤妹”写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家书”，将一些老话一遍又一遍从头讲到尾，自称“愚兄鲁钝”，“自幼无缘文化”，“饮恨终生”，“幸亏学了一门手艺”，“终能自食其力”，“眼见三儿日渐成长，有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虽在外做一名劳工，常遭轻视与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时，还讲些大道理，说什么“自己老朽落后，无力报效祖国”，“能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让孩子上学”，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为社会

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因此“问心无愧”，等等。这些家信是我母亲用来对三个儿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们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当时，我们读起来并不耐烦，那些信都写得长了一些，语句颠三倒四，车轱辘话来回转。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这些家书，比当时那些政治课教材对我们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

当然，这个老打工仔常寄回来的远不止他那些冗长的“咏叹调”，还不时有些日用品与文具寄回来，如给“贤妹”的袜子、围巾，给儿子的钢笔、优质笔记本等等。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则经常定期寄些食品回家，从阿华田、丹麦饼干、白糖到香肠、猪油……这些源源不断的补给竟使得母子四人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无人得那种大为流行的“浮肿病”。其中远在北方的那个蠢材，收到这类食物补给后，往往在食堂吃完自己那点“定量”再回到宿舍偷偷地享用，有时不免碰见同事，当然只能慷慨请客，虽为私下进行，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久后，在一次“思想整风”的“组织生活”中，就有革命同志对此严正指出，这是“炫耀自己有海外关系”。那时的香港，还是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的海外”。

至于那些年里老打工仔自己在外的生活呢？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在“平安家书”里总是说自己“一切都好”、“家人皆可放心”之类笼统而不具体的话，家人对此半信半疑，认定他的生活必定是艰辛的，必定有不少需要他“咬紧牙关”的困难，因此，老是不断劝说他退休回家。但他仍然坚持着，最终答应等他最小的儿子大学毕业，他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平生最大的任务，一定回来和家人团聚。培养出三个大学生，这就是他平生的夙愿，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眼见他日益接近“功德圆满”，大家都等着这一天的来到。

小弟的大学毕业日益临近，不到一年了。突然，有两三个月，老打工仔与家里中断了联系，音讯全无，家人焦急万分。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来了一封“平安家书”，告诉家人一个胆战心惊的迟到消息：他劳动时在水泥地面上摔了一跤，把一条大腿摔成了骨折，幸亏被香港公立的慈善医院将他作为“没有亲属”的失业老人收容进去，免费给他动了大手术，在折断的腿骨上安装了一个铁块，两个铁钉，经过几个月的疗养，总算得以痊愈，能够自己行走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不久即可出院，返回自己“日思夜想的故里”与家人团聚……他的“家书”里没有什么感伤情绪，倒是

说很高兴能住进那宽敞明亮的医院，那是他“一辈子中住的最好的房子”。我记得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他穿着住院服，坐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脸上是一副像儿童一般天真的乐呵呵的笑……

从这件事开始，他那长期不为家人所知、“咬紧牙关”的生活状态，才逐渐浮现出来，进入我们的视线：香港的房租极贵，为了省钱，他向一套公寓中几户人家租用了公共浴室午夜后的“使用权”，每当夜深人静，无人再上浴室冲凉时，他便在那里架一张行军床睡觉，天一亮就撤出。白天，则在楼顶的露天平台上打发时光；没有人雇他时，他就坐在平台的一张竹椅上出神。平台上支着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光，可以避风雨，但碰到大雨，光靠那把伞可不行，还得在那把大伞下自己再打一把雨伞……而在有人雇他办筵席时，他就把用料备齐，在平台上进行制作，将一道道菜做成半成品，然后运到东家的厨房，待开席时下锅烹制……光秃秃的一个平台，竟成了排列有序的复杂劳动的场所，居然从这里，他做出了“名厨”的名声，得到过采访，上过报纸。也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有一次他劳动时踩在有油污的地面上，狠狠地、重重地摔了一跤，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这年，他六十有五。

这就是他十六年打工生涯的一个缩影，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夙愿、一种向往而受着、熬着、挺着的缩影。就其含辛茹苦、艰苦卓绝的程度而言，比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培养了一个大学生的挑水夫，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挑水夫，好歹在巴黎一套公寓的门房里，

：柳世和夫妇（前排）和三个儿子以及大儿媳朱虹（后排左二），后排左三为作者。



还有自己的一个栖身之地啊！

他快返回故里的时候，我请了探亲假回到老家，等候他的归来。究竟哪一天到家，他没有通知家人，我们等了好几天仍未见消息。这天早饭后，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我问了一声：“也不知道哪一天到？”母亲茫然道：“大概快了吧。”我走出家门，到街上随便溜达。那时，长沙城不大，火车站离闹市不远，我信步走到那里，想先看看车站情况，以便将来迎接。这时，正好有一趟广州来的火车到站，我便站在月台门外不经意地观看。到站的旅客都快下完了，我突然看见从一节车厢里下来一个矮墩墩的头发花白的老头儿，穿一身黑色的港式唐装，手提两个陈旧的提包，朝出口处走来。他没有远方游子归来时那种东张西望的神情，而是闷着头快步走，似乎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一个念头，像一头埋头拉车不看路的老牛……我认出了他，猛然一阵心酸，还没有等他走出站口，我就失声哭了起来……

他返回故里后，总算过上了退休的生活，总算亲眼见到了三个儿子都已经走出大学校门，参加了工作，总算看见了自己的孙女与孙子。他绝不下厨做菜，说是一辈子在厨房待“伤”了，听小弟说，他绝无仅有地只露了一次绝技，做了一盘萝卜丝饼。家人回忆说，那简直就是极品、绝品，你根本吃不出是萝卜丝做的，与刘姥姥在大观园吃上的烧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几年中，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听人家谈论他家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只要别人奉承他说“四爹，你靠一把菜勺培养了三个大学生”，他就笑得合不上嘴，傻乎乎的……

1975年夏，他因为得了急症而去世，家人都叹息他返回故里后只享受了几年的“清福”，这与他一生的劳累艰辛实在是太不相称了。丧事后，骨灰里剩下一个铁板，两个铁钉，小弟把它们收藏起来作为纪念，这是他作为幼子的一番心意。如今小弟去世也已几年，每当我想起这事，心里就一酸……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追忆朱光潜先生

最近，在《文汇报》的《笔会》版上，看到一篇回忆朱光潜的短文，是著名摄影家邓伟写的，并附有他拍摄的一张朱老先生的照片。由于父辈的关系，他曾有幸成为朱光潜的一个较为亲近的小字辈，因此，保存了若干对老先生的亲切回忆。这篇文章与这张照片，也激活了我自己对朱光潜先生的思念。

在上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怀旧倾向是一种天然的温床，外来的因子哪怕只像蒲公英飞絮那样轻忽，也可以萌生出一片繁茂葱郁的回忆绿茵，就像普鲁斯特舌尖尝到的那块玛德莱娜小甜点，竟引发出如流水潺潺不绝，似江河浩渺流淌的陈年往事那样。一般说来，怀旧的心理惯性是以两个条件为基础的，一是往日积累了丰富而生动的印象与感性知识，一旦记忆的闸门打开，往日的印象、感觉、对形象与氛围以至颜色、气息的记忆即纷至沓来，如势不可挡的潮水，就像普鲁斯特那样，忆出了整整一个“似水年华”，并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另一个条件，则是往日在某件事上、在某个方面感触甚深、震动甚大，一旦再次引发，便感触陡生，思绪纷呈，鲁迅夜遇一个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却引发出一大篇的感言，大概就是这种情形的例子。

说实话，我与朱光潜先生并不熟稔，也不接近，具体的交往并不很多，因为我和他不是在一个单位任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就像他与张隆基那样，几年前，学术文化界曾有人把我称为“朱光潜的学生”，基本上是一种牵强附会。原因不外有三：一、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而朱先生就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但我在北大时，却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二、我也做过一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与翻译，而朱先生就是西方批评史、西方美学史的权威；三、朱虹的确是朱先生的受业子弟，在北大上过他的翻译课，曾被朱先生称为他的“三个得意学生”之一，此事在学界广为人知。因为朱虹与我是一家人，难免有人会把我这一粒鱼目误

认为是“珠子”了。

虽然我与朱光潜先生相隔不近，接触不多，交往甚少，但是在学界长辈中，他却是我从年青时代一直到上了岁数，仰望得较多、关注得较多、思索得较多、揣摩得较多的一个，因此，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就很容易就引发出不少记忆与思念，何况有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足以使我终生难忘。

二

在前辈师长中，我最早知其名者，要算是朱光潜。那还是在中学时期，从初中起我就喜欢跑书店，在书店里曾不止一次见过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也曾翻阅这本书，当时觉得书中所谈的好像都是比较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的内容，什么美呀，艺术呀，审美呀，隔我那尚未开窍的脑袋比较远。那时，我感到亲切、有吸引力的只是还珠楼主、《鹰爪王》与侠盗亚森罗萍之类的书。即使后来到了高中快要毕业，准备投考西语系的时候，我仍然对朱光潜的那高深的美学未敢问津。真正对朱光潜这个名字肃然起敬，那是在进了北大西语系以后的事了。

在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新生在校内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从毕业生的介绍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

萝蕊、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骢、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对于这一大批名师，西语系的学子无不津津乐道，并都引以为骄傲。

显而易见，冯、朱二位当时之所以就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业绩更大，学术声望更高。冯至不仅是公认的德国文学权威，而且是鲁迅

:: 老年的朱光潜先生



赞赏过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杜甫研究也是蜚声学术界。朱光潜则早已是资深的美学研究的大师，早年几部力作并没有因为时代历史的变迁而褪色，也没有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丧失其学术价值，而且，早在抗战期间，他就担任过大学里的文学院长，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尊重文化，还曾接见过他，蒋介石撤离大陆前，他也是国民党派专机要抢运到台湾去的名教授之一，但他拒绝登机离去……

学子的崇拜从来都是名师崇拜，大部头论著崇拜。从一开始，朱光潜就足以使我辈肃然起敬，甚至有点顶礼膜拜。虽然他在“政治上”入过国民党，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但“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也不感兴趣，何况他不是最后拒绝站到台湾那边去吗？所有这一切，使我从没有对他有什么保留。

仅仅是以学术标准进行衡量，而不是掺杂了其他标准或其他因素，这与现如今比较起来，倒可说是单纯朴实一些。现今者，时代进步了，实际操作的标准显然复杂细腻多了，其中有了官本位制的成分，有了商品社会中大为时兴的公关学的成分，以至于在赫赫有名的“翰林院”里，没有多少学术业绩，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却头戴“特级研究员”、“博导”、“一级教授”的冠冕堂皇者颇有人在。

在北大的几年中，西语系这两个“一级教授”，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倒常能见到，另一位朱光潜，则是很难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几次，即使有他也不大出席，听说他前两年教英文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高年级毕了业，他就不教课了，西语系教学中心的那幢楼也就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是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儿从附近穿过，有同学才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健，全身透出凝重肃穆之气。

三

我与朱光潜开始有具体的接触，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1953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隶属于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

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其中的西方文学研究组，起初就在北大西语系办公，和朱光潜可算是同一个大单位的。到了1958年以后，这个研究所才从北大独立出去，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其他研究所组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至于这个学部又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是“文化大革命”后得胡乔木与邓力群之力而成的。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方针是：有计划地、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各时代、各流派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和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及创作技巧的专著与论文，以古典论著为主。显而易见，刊物突出了一个“洋”字，一个“古”字，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艺势头正健、“大”“洋”“古”的倾向不止一次受到责难与批判的时代条件下，倒是属于另外一格，颇带来一股典雅文化的清新气息。编委会的组成也一目了然，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教授、翻译家都一一在列，如钱钟书、朱光潜、李健吾、杨周翰、傅雷、陈占元、田德望、金克木、陈冰夷、辛未艾、蒋路、蔡仪……一看就与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文艺家、理论批评家不属同一路人，颇有学院派的色彩。编委会并未明确主编，但召集与整个编辑工作的主持者都是蔡仪，他实际上就是主编。

我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工作。在蔡仪手下，具体做编辑工作的有三个人，两个搞俄语的都比我年长，其中还有一个是从延安来的，他们都是我的上司、指挥者，我是年轻的西语系大学毕业生，于是到一个个编委那里、特别是到西语系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由我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一般具体联系与具体跑腿的工作并不简单，主编先把未来几期的中心主旨拟定，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浪漫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等，之后就要征求编委们的意见了，包括每一期的重要选目与每一篇的译者人选，以及请编委审定译稿等等。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特别喜爱，因为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知识含量，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何况骑一辆自行车驰来驰往于中关村与燕南园之间及未名湖畔，沿途垂柳飘飘，湖波粼粼，绿荫掩映，小径成趣，出入学术界名人的府第、寓所，又肩负